

政府 2.0 的扩散及其影响因素

——一项跨国实证研究

● 马 亮

(南洋理工大学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 新加坡 639798)

摘要:本文旨在识别影响社交媒体或 Web 2.0 技术在政府中扩散的关键因素。利用《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各国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数据,使用 Logit 模型实证分析政府 2.0 在全球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包括政府规模、财富状况、电子服务和电子民主等在内的政府资源与能力因素是驱动政府 2.0 在全球扩散的主要因素,而公众的需求与压力、政府自身的规范、国际竞争与学习等并未产生显著影响。研究局限在于关注各国中央政府,结果可能不适用于地方政府;研究基于截面数据,无法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践价值在于,本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政府 2.0 及其扩散具有重要启示,并有助于政府部门推动其广泛使用并发挥积极影响。作为较早对政府 2.0 扩散展开的实证研究,本研究有助于理解新兴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应用及其驱动因素,并填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

关键词: 政府 2.0; 社交媒体; 创新扩散; 电子政务; 跨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162(2014)01-0127-10

1 引言

以社交媒体和 Web 2.0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席卷全球,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接受并尝试这些新兴技术所带来的高效、便利和即时的沟通模式^[1,2]。公共部门也不例外,全球各国的政府、政治家和公共管理者们都在积极采用这些技术,加强信息公开、网上服务和在线沟通等功能,使“政府 2.0”呼之欲出^[3-5]。韩国总统朴槿惠甚至提出“政府 3.0”的概念,以期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政府开放、共享、沟通和合作等目的^[6]。

2012 年联合国的调查显示,193 个成员国中有 78 个国家(40%)的中央政府网站安装主流社交媒

体的应用链接,有 14 个国家(7%)使用聊天室或即时消息工具直接获取公众意见^[6]。无论是美洲、欧洲,还是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都有国家使用社交媒体,甚至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如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

图 1 显示了全球主要国家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分布情况。从中可以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已较为广泛,但具有较强的集聚性。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多数国家的政府普遍应用该技术,其采用比例依次为 60%、53.49%和 42.55%。非洲和大洋洲的国家则很少涉足这项技术,其采用比例分别只有 22.22%和 14.29%。

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亚洲国家等的调查都发现,政府部门在加快应用 Web 2.0 技术^[7-12]。中国虽然屏蔽这些应用,但国内自主开发的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和微信等平台同样为政府应用提供选择^[13-17]。可以预期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会在不久的将来采用 Web 2.0 技术,实现政府 2.0 的全面覆盖。为什么政府部门会采用社交媒体?哪些因素驱动社交媒体的政府应用?显然,理解政府部门采用社交媒体的驱动因素,对于进一步认识政府 2.0 的演化动态与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为一项方兴未艾的新兴技术,社交媒体的应用时间较短,政府部门采用的历史则更为短暂。因

收稿日期:2013-08-26

作者简介: 马亮(1984-),男,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绩效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公共组织绩效管理与创新,E-mail:liangma@ntu.edu.sg。

①在已有文献中,学者们经常交互使用 Web 2.0、社交媒体、社交网络等术语,并认为它们属于同一种现象。本文不对这些概念做进一步的辨析,而认为它们都指代第二代信息技术的具体应用,并根据行文需要交互使用。

②参见:<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6-19/4946345.shtml>。

③数据来自《2012 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的第 109 页,参见:<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un-dpadm/unpan049752.pdf>。



注:本图为作者自制,有关各国政府使用社交媒体的数据来自文献[6]。

图1 全球各国政府使用社交媒体的整体状况(2012)

此,有关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实证研究还不多见。一些学者描述了社交媒体在政府部门采用的分布状况,并初步探讨了政府采用的影响因素。例如,有学者对全球82个国家的电子参与和社交媒体应用进行实证分析^[18],还有学者研究政务微博在中国的扩散情况及其影响因素^[19,20]。本文期望采用全球主要国家的总体数据,实证分析社交媒体在各国政府之间扩散的影响因素。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经历了20世纪末的电子政务浪潮以后,政府部门在新兴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开始进入政府2.0时代。早期的电子政务主要以政府网站和管理信息系统为代表,着重为公民和企业提供便利的在线服务,并提供一定程度的在线沟通功能。整体而言,早期电子政务(或政府1.0)的特点是单一性、单向性、封闭性、延时性、静态化。许多政府网站甚至只是充当“电子公文”的角色,将物理形态的政府文件转换为电子形态并对公众传达。尽管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在线咨询等接收公众的意见和反馈,但总体来说这些功能都受到极大局限,电子参与程度一直无法有效提升^[21]。

社交媒体和Web 2.0技术为改变这种状态提供了利器,它们通过免费、双向、即时、开放、多元、动态的信息平台,为政府与公民的全方位沟通与交流提供了契机^[22]。在这些平台上,所有人都手握“话筒”并拥有平等的发言权,政府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信息传递员和接受者参与各种公共讨论。为了扩大影响力,政府需要吸引大量追随者,而这就有赖于政府降低身段并以平民化的姿态与公众互动交流,从而为重树政府形象和赢得政府信任创造可

能。由此可见,政府2.0在电子政务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实质性的跃迁,在颠倒政民关系的同时也重塑二者的互联网定位与行为。

社交媒体或Web 2.0技术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浪潮,使用社交媒体可以增强政府透明度和公民信任感^[23]。社交媒体为政府部门创新提供技术可能,使许多服务和功能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中实现。结合其他信息技术创新(如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大数据、云计算等),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部门利用社交媒体传播预警信息、搜寻破案线索并查找受困人群。决策部门能够很快从公众获取有关某些政策提议的海量意见和建议,从而为政策修订和完善提供条件。互联网“一呼百应”的特点使政府部门可以更快地实现社会动员,通过“人海战术”解决许多传统技术无法解决甚至难以想象的棘手政策问题。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之间通过社交媒体实现更加无缝隙和实时性的跨职能协调与合作,从而为互通信息、共享资源并共同解决大型复杂政策问题创造机会。因此,政府2.0呈现比政府1.0更大的比较优势,而这是驱动其应用和扩散的主要因素。

尽管社交媒体的应用前景广阔,但并非所有政府部门都会应用。一些政府部门率先垂范,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先锋式地尝试和使用社交媒体。另一些政府部门则抱持观望态度,犹豫不决,并等待合适的应用时机。还有一些政府部门迟迟没有应用,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政府部门之所以对社交媒体“既爱又恨”,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新兴技术具有“双刃剑”的特点,往往伴随着不确定性、风险、失败、错误和危机。政府部门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采用这些新兴技术,有可能并未带来预期的

正面效应,反而会因为这些技术的“后坐力”而蒙受利益损失和政治风险^[24]。例如,一些政府部门开通政务微博,但由于习惯了官样文章的做派而很难适应互联网世界的用语风格和沟通规则,常常因为“说错话”而招致网络非议和形象受损。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因为政务微博而广开言路,但也平添了更多的公众诉求,俨然成为“第二信访局”。由于人手不足、精力不济或跨部门协调桎梏,这些政府部门通常会陷于无法应付乃至替人受过的尴尬局势。显然,即便是面对这样一项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技术创新,政府部门的表现也是千差万别,而识别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府2.0的发展规律,并为更加理性和审慎地推动其应用和扩散提供启示。

对于潜在用户而言,社交媒体可以被视为一项技术创新。创新不等于发明,它并非创造新的事物,而是指采用相对于采用者而言是新的事物即可^[25]。社交媒体可能在A地应用多时,但如果B地没有采用,那么对于B地而言它就是一项创新。创新的扩散指某个创意或新兴事物在特定社会系统的成员中传播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社会演化过程^[26]。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学者们提出了解释创新扩散的许多理论,并对诸多领域的创新扩散现象做了大量研究。组织创新和信息技术创新的文献为本研究提供启示,可以用于考察政府作为组织采用社交媒体的过程^[27-30]。另外,政治学者研究了大量政策创新在不同辖区政府之间的扩散现象,也构成考察社交媒体扩散的理论养料^[31]。本文博采这些理论和研究成果,结合社交媒体的新兴特点,提出一个解释其扩散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和相应的研究假设。

综合已有文献,特别是最近几项电子政务和社交媒体扩散研究^[32,33],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这些影响因素及其对应的研究假设可以归纳为四类:政府资源与能力假说、公民压力假说、政府规范假说、府际竞争与学习假说。Mohr、Berry和Berry、Christensen等发展了组织与政策创新的动机-能力理论框架,认为组织的动机与能力是决定其能否及如何采用创新的关键因素^[27,31,34]。在上述研究假设中,政府资源与能力假说、政府规范假说都是政府内部因素,而公民压力假说、府际竞争与学习假说则是政府外部因素。政府资源与能力属于政府能力范畴,即代表政府是否有能力采用某项创新。其他三类假设则指代政府动机范畴,它们解释政府是否有足够强烈的激励采用某项创新。这些因素整合政

府内外的主要变量,综合解释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意愿和能力,并回答政府是否愿意及是否有能力发展政府2.0。

(1)从技术跃迁和技术推动的角度,互联网和电子政务是驱动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主要因素^[35]。社交媒体虽然是免费使用的互联网平台,但政府部门为了能够积极响应公众的即时海量信息,往往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对中国政务微博频频出现的“僵尸微博”的调查发现,缺乏专职人手和管理精力是影响其发展的首要因素^[36]。相对来说,规模较大、财力雄厚的政府更倾向于采用社交媒体,而规模较小、财政窘迫的政府则往往无力承担由此引发的大量成本^[39]。在电子政务发展中表现较好的政府,往往具有较强的动力和能力去应用社交媒体。政府在电子政务发展中积累的专业技术、专职人力资源和技术基础设施等,都为进一步发展社交媒体提供基础条件^[20]。

(2)社交媒体应用是政府与公民互动的结果,公民对政府应用社交媒体的强烈需求和舆论压力是驱动政府采用的关键因素^[37]。如果没有大量活跃且积极参政议政的公民对政府构成强大的外部问责压力,政府很少有足够的动机去使用可能伴随过错、风险和失败的新兴技术^[38]。社交媒体的主要对象是广大互联网用户,强大的用户基础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首要因素,也是政府对其技术前景和政策意义予以考量的关键所在。

(3)政府应用社交媒体的动机也可能来自自身的内在政治要求或政治规范。正如人的道德自律会驱动其道德观念和行为一样,政府也会因为其内源性的政治规范和承诺而作出与之相适应的行为选择。社交媒体强调政府进一步提升其信息公开和透明程度,推动政府更加积极地同公民互动和交流,并赋予公民更大的话语权,而这些都有赖于政府自身的价值匹配^[39]。如果政府对诸如民主、透明、参与、自由等价值观缺乏认同感,那么很难想象它会对承载这些价值观的社交媒体感兴趣。

(4)政府应用社交媒体并非孤立的事件,而会受到其他政府行为的影响。这种传染效应是解释政府创新扩散的主要因素,而从众心理和制度合法性压力是其关键所在^[40]。政府越多、越强烈地参与到的其所在的社会网络,就越有可能受到网络中其他主体的影响。相对于一个特立独行的政府来说,迎合其他多数成员组织的意愿和选择,可能更容易赢得尊重和信任^[41]。与此同时,新兴技术往往孕育着机

遇并为率先引入的政府提供“先行者优势”,而政府有可能为赢得比较竞争优势而积极采用这些技术。

综上所述,这四组研究假设从政府内部与外部、上级与下级、动机与能力等维度考察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驱动因素,可以对政府 2.0 的扩散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较为全面的解释。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有助于廓清创新扩散理论在社交媒体的应用边界,并为理解其扩散现象提供理论启示。

3 研究假设

3.1 政府资源与能力

政府资源与能力假说认为政府资源与能力是决定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而在影响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资源与能力因素中,主要考察如下变量:

(1) 规模越大的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结构更复杂、能力更强,也更有承担风险和容忍不确定性的能力,并更有可能采用社交媒体^[42,43]。通常来说,人口规模同政府规模紧密相关,后文也将用其作为衡量政府规模的代理变量。

H1: 政府规模越大,采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就越大。

(2) 政府的财政能力越强,投资信息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倾向于采用社交媒体^[44]。辖区财富状况(如人均 GDP)预示政府的税基和财力大小,可以用于衡量政府的财政资源。

H2: 财政资源丰富的政府更倾向于采用社交媒体。

(3) 信息技术的应用依赖于专业技能,政府在电子政务发展方面表现出众,则有可能“更上一层楼”而发展社交媒体^[45]。联合国将电子政务(E-Government)和电子参与(E-Participation)或电子民主(E-Democracy)予以明确区分^[6]。电子政务指代政府信息技术使用的成熟和复杂程度,如政府网上服务和功能的多元性。电子民主指政府通过互联网实现公民参政议政的程度,如电子投票、电子投诉等。电子政务和电子民主都是社交媒体应用的前提条件,也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H3: 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越高的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越大。

H4: 电子民主程度越高的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就越大。

3.2 公众需求与压力

公众压力假说强调公众的需求和压力是推动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关键所在,而公众能否对政府

采用社交媒体构成舆论压力,往往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即公民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和受教育程度^[46]。

互联网渗透率指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中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其值越大,通常表明该地区居民的互联网使用越普及,对政府发展电子政务和社交媒体的需求也更大^[39]。因此,互联网渗透率可能与一国采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正相关。

H5: 互联网渗透率越高的国家,其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就越高。

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民参政议政的倾向和能力都越高,接受社交媒体的意愿也更强,对政府使用这些新兴技术所构成的压力也更大^[38]。

H6: 公民平均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更倾向于在政府中采用社交媒体。

3.3 政府规范

政府规范假说认为政府的内在自我规范和约束是驱动其采用与之相匹配的创新实践的主要因素。政府规范存在许多方面,如政治民主程度、政府透明廉洁程度、媒体自由程度等。此外,公民问责与发声、政府有效性等也是政府规范的重要维度,但它们同上述维度高度相关且多有重叠,在此不予考察^[47]。

政治民主程度越高,政府对公民的诉求越积极响应并有求必应。在 Web 2.0 技术普遍推广的背景下,相对民主的政府通常会因应越来越多的使用者而开发此类应用。面对数量庞大的社交媒体用户,民主国家的政府往往期望借助于这样一个强大的技术平台来实现对选民的影响和动员,因此更愿意采用这些技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独裁制或威权式政府则很少对公民需求做出有力反应。社交媒体酝酿并导致“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的先例也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对之有所忌惮,不愿轻易开启社交媒体^[48]。

H7: 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倾向就越强。

社交媒体前所未有地实现政府对公民的高度透明,使政府在互联网面前无所遁形。无论是政府主动披露,还是被动接受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政府都不得不面对社交媒体所展现的透明张力。崇尚透明公开的政府期望通过社交媒体实现进一步透明,因此更倾向于发展政府 2.0^[23]。研究显示,不是电子政务影响政府腐败,而是政府腐败限制电子政务发展。掌握既得利益的执政者通常不愿意发展电子政务,因为这会暴露其腐败行踪和非法所得^[49]。

H8: 政府透明程度越高, 就越有可能采用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使人人都有“麦克风”, 一改政府对官方媒体的信息垄断, 从而实现了媒体自由化的最大限度。社交媒体对政府媒体垄断的挑战, 往往令许多独裁制或威权式政府无所适从, 因为这严重挑战它们的价值取向。相反, 原本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表现较好的国家则可以非常顺利地实现向社交媒体时代的平稳过渡^[50]。

H9: 媒体自由程度越高的国家, 政府就越倾向于采用社交媒体。

3.4 国际竞争与学习

府际竞争与学习假说认为, 政府是否采用某项技术或政策创新, 常常会事先观察并参考其他同类政府的表现。如果同类政府多数采用某项技术或政策, 那么该政府通常会出于竞争压力而选择采用类似创新^[51]。以税收减免为例, 如果邻近地区多数予以减免并成功吸引大量投资者, 那么政府推行类似政策的竞争压力就较强, 否则相对税负差距将使投资者奔向其竞争对手, 并可能诱发本地企业搬迁或抽离资本^[52]。所以, 应用社交媒体的邻国政府比例越高, 该国政府采用的倾向也就越大。

H10: 邻国政府应用社交媒体越多的国家, 采用这项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

学习和模仿同类组织的实践, 通常可以降低创新成本和失败风险。政策转移和政策学习是跨国政策研究的核心议题, 也是追踪政策走向和影响的主要路径^[53]。在此过程中, 国际组织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往往成为政策转移的媒介和载体^[54]。当政府参与的专业组织越多时, 吸收同类政府的先进经验和实践做法的机会就越多, 就越有可能采用类似创新。此外, 对外经济贸易、政治外交与沟通等都发挥关键作用。以 KOF 全球化指数衡量各国学习其他国家的机会, 本文假设它同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正相关^[55]。

H11: 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国家, 越倾向于采用社交媒体。

4 数据与方法

4.1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对象是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 基本代表全球所有主权国家, 因此可以视为总体层面的推断统计估计, 不存在明显的抽样误差问题。由于部分变量的数据缺失, 最终进入回归模型的观测点少于所有成员国数量。显然, 与局限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相比, 采用全球主要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为考察国家间差异及其驱动因素提供了可能。由于国家层面的中央政府决策通常带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 因此研究发现并不一定适用于次国家(如州)和地方层面。

因变量的数据来自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自变量的数据来自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提供的各国经济、社会、技术和政治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都公开披露且经过校验, 具有很高的信度。

4.2 因变量

各国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数据来自 2012 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 它监测并统计其成员国的中央政府网站使用两类主流社交媒体的情况。本文将使用至少一种社交媒体的国家编码为 1, 而将未使用的国家编码为 0。这种二分法的测量策略较为简单, 但能够捕捉各国的微妙差异。主流政策扩散和组织创新研究通常采用类似的二分法, 虽然最近的研究开始尝试使用更精确的测量方法^[56]。

如前所述, 联合国选择 Facebook 或 Twitter 作为成员国政府是否采用社交媒体的判断标准。但是, 由于政治考虑、语言障碍和技术屏蔽等因素, 许多国家使用的并非这两个最流行的平台^①。从跨国研究的角度来说, 需要一个统一标准去比较各国政府 2.0 的状况。联合国以各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的应用链接作为判断依据, 可以避免多源数据偏差和高估各国应用状况。中国各地政府使用微博等社交媒体, 一些中央部委(如外交部、国家统计局等)也利用该技术, 但中央政府(国务院)至今并未使用, 其官方网站(www.gov.cn)也没有应用链接。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联合国对政府 2.0 的判断标准是可信、可比和有效的, 符合本文的研究旨趣。

4.3 自变量

各国的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②, 对其取对数处理, 以使其趋向于正态分布。

各国的人均 GDP 数据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 取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经济数据来衡

①例如, 根据 Alexa 提供的网络流量数据, Facebook 是全球使用最多的社交网络工具, 但不同国家的使用状况差异较大。中国用户以腾讯 QQ 为主, 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是 V Kontakte 和 Odnoklassniki, 印度和巴西是 Orkut, 韩国是 Cyworld, 伊朗等阿拉伯国家则是 Maktob 和 Cloob, 都使用本国版本的 Web 2.0 技术。

②参见: http://esa.un.org/unpd/wpp/unpp/panel_population.htm。

量各国政府的财富状况^①。

各国的电子政务和电子参与数据来自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②,它们都是综合指数,经标准化处理后取值0到1。其值越大,表明电子政务和电子参与水平越高。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由在线服务指数、通信基础设施指数和人力资本指数合成,以下采用其分项指数来衡量对应变量。

互联网渗透率和人均受教育水平来自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互联网渗透率的原始数据由世界电信联盟提供,是反映各国通讯基础设施情况的主要指标^③。各国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原始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标准化后使用^④。

各国民主程度的数据来自经济学家资讯部的民主指数^⑤。它通过选举过程与多元性、政府职能、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和公民权利等衡量各国民主程度^[57]。

政府透明的数据来自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⑥,它是反映各国廉洁透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作为政府腐败的逆指标,其值越大,表明该国政府越透明^[58]。

有关各国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数据来自自由出版社的世界自由调查^[59]。此外,利用自由出版社提供的各国对 Facebook 和 Twitter 审查的数据,因为对其审查的国家通常不会利用这些平台。该变量为二分变量,1 表示政府审查,0 表示不审查^⑦。

各国临界的地理数据来自 COW 各国接壤数

据库中的二维接壤矩阵^⑧,1 表示接壤,0 表示不接壤^[60]。将中央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邻国数量除以其邻国总数,计算邻国采用比例。该变量取值0到1,其值越大,表明该国面临的邻国竞争效应越强,该国政府越有可能采用社交媒体。已有研究采用此前一年的邻国竞争效应来考察次年该国的采用概率,但限于数据可及性,截面数据无法对这种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KOF 全球化指数通过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多项指标衡量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市场和社会的程度^⑨,可反映该国与其他国家沟通与交流的情况^[55]。该指数比对外贸易总额、各国参与的国际组织数量等变量更为合理。

4.4 模型设定

由于因变量属于二分哑变量,它违背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的许多前提预设(如齐次性、线性估计等)。因此 OLS 不再适用,需要 Logit 或 Probit 回归模型予以估计。由于主流创新研究文献多数采用 Logit 模型,而且二者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实证分析使用 Logit 模型^[61]。采用经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以降低异方差的干扰。为便于解释回归结果,报告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

5 实证结果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对若干取值较大且偏离正态分布的自变量进行对数转化,使其趋向于正态分布且回归系数易于解释。各变量的观测点从156到193之间,后文将基于数据齐整的观测点进行模型估计。

5.2 相关分析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矩阵。多数自变量同因变量显著正相关(除媒体自由和政府审查以外),初步证实各研究假设。电子政务与电子民主高度正相关($r=0.889, p<0.05$),媒体自由与政治民主高度负相关($r=-0.918, p<0.05$),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将这些变量分组带入回归模型,以避免多重共线性对估计结果稳健性的影响。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允许范围内,各回归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平均值介于3.08至3.45之间,远小于临界值10.0,表明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威胁^⑩。

5.3 回归分析

表3报告Logit回归分析结果。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部分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而分别代入模

①参见: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1/02/weodata/index.aspx>。

②参见: <http://unpan3.un.org/egovkb/>。

③使用各国注册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用户规模来衡量该指标更为合适,因为因变量恰恰是政府使用这些平台的情况。但有关各国用户规模的精确数据无法获取,因此使用互联网渗透率来衡量该变量。参见: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stat/default.aspx>。

④参见: <http://hdr.undp.org/en/reports/>。

⑤参见: http://www.eiu.com/public/thankyou_download.aspx?activity=download&campaignid=DemocracyIndex2011。

⑥参见: <http://www.transparency.org/cpi2011>。

⑦参见: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1>;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net/freedom-net-2011>。

⑧参见: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COW2%20Data/DirectContiguity/DCV3desc.htm>。

⑨参见: <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

⑩人均 GDP 与互联网渗透率($r=0.853, p<0.05$)、互联网渗透率与政府透明($r=0.824, p<0.05$)、人均 GDP 与人均教育水平($r=0.762, p<0.05$)、人均 GDP 与政府透明($r=0.768, p<0.05$)之间也存在较高的正相关关系,但并未影响多重共线性的诊断结果,因此未对其进行单独回归分析。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观测点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	观测点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交媒体采用	193	0.404	0.492	0	1	政治民主程度	165	5.476	2.187	1.08	9.8
人口规模*	193	3580	13500	0.9847	132000	政府透明程度	178	3.987	2.090	1	9.5
人均 GDP*	193	15031.93	25264.82	111.679	170372.9	媒体自由程度	191	3.288	1.964	1	7
电子政务水平	192	0.432	0.237	0	1	政府审查制度	193	0.187	0.391	0	1
电子民主水平	193	0.220	0.255	0	1	空间效应变量	156	0.351	0.241	0	0.833
互联网渗透率	193	32.792	27.822	0	95	全球化程度	192	65.711	22.145	4.59	98.43
人均教育水平	193	0.717	0.209	0	1						

注:*表示这些变量在回归分析中代入的是取对数后的值,在此报告原始值以方便解读。

表 2 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社交媒体采用	1											
2 人口规模	0.233	1										
3 人均 GDP	0.339	-0.201	1									
4 电子政务水平	0.481	0.307	0.693	1								
5 电子民主水平	0.532	0.288	0.576	0.889	1							
6 互联网渗透率	0.343	-0.089	0.853	0.765	0.643	1						
7 人均教育水平	0.210	-0.177	0.762	0.561	0.436	0.676	1					
8 政治民主程度	0.213	-0.055	0.607	0.622	0.454	0.664	0.505	1				
9 政府透明程度	0.228	-0.161	0.768	0.713	0.587	0.824	0.525	0.696	1			
10 媒体自由程度	-0.095	0.322	-0.522	-0.381	-0.264	-0.565	-0.471	-0.918	-0.628	1		
11 政府审查制度	0.066	0.296	0.006	0.120	0.128	-0.006	0.032	-0.364	-0.124	0.417	1	
12 空间效应变量	0.256	-0.119	0.514	0.441	0.349	0.512	0.455	0.277	0.437	-0.252	0.015	1
13 全球化程度	0.165	0.476	0.212	0.430	0.356	0.308	0.222	0.464	0.312	-0.242	0.000	0.197

注:绝对值大于 0.15 的相关系数都在 0.05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 3 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 Logit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人口规模	0.0479(0.0343)	0.0534*(0.0311)	0.0454(0.0334)	0.0539*(0.0307)
人均 GDP	0.108**(0.0534)	0.102**(0.0458)	0.100*(0.0532)	0.0954**(0.0462)
电子政务水平	1.049*** (0.330)		1.114*** (0.328)	
电子民主水平		0.780*** (0.280)		0.832*** (0.280)
互联网渗透率	0.000851(0.00319)	0.00167(0.00276)	0.00197(0.00318)	0.00258(0.00285)
人均教育水平	-0.342(0.259)	-0.240(0.236)	-0.453*(0.254)	-0.333(0.228)
政治民主程度	-0.0167(0.0299)	0.000774(0.0262)		
政府透明程度	-0.0526(0.0347)	-0.0431(0.0368)	-0.0611*(0.0349)	-0.0484(0.0367)
媒体自由程度			0.0196(0.0287)	-0.0880(0.0960)
政府审查制度	-0.133(0.104)	-0.0794(0.0922)	-0.148(0.105)	0.00679(0.162)
空间效应变量	-0.0496(0.166)	-0.0303(0.164)	-0.0166(0.162)	-0.00181(0.00198)
全球化程度	-0.00107(0.00208)	-0.00111(0.00197)	-0.00169(0.00207)	-0.000197(0.0255)
观测点	143	144	144	145
Wald χ^2	42.18***	31.54***	38.21***	31.52***
伪 R ²	0.3002	0.3277	0.2897	0.3184

注: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社交媒体采用;括号外为回归系数的边际效应值(dy/dx),括号内为经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 0.10、0.05 和 0.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常数项未报告。

型。回归模型得到较大比例的解释, 伪 R^2 约为 0.30, 且 Wald χ^2 都通过 0.01 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表明这些自变量能够充分解释社交媒体在不同国家的扩散。

分析显示, 人均 GDP、电子政务与电子民主都对政府 2.0 的扩散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而人口规模在一半的模型中通过 0.10 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表明, 政府资源与能力假说获得全面支持。电子政务和电子民主对政府使用社交媒体产生最显著的影响, 表明在电子政务和电子参与方面发展较强的国家更有能力发展社交媒体。H1 得到部分支持, 而 H2、H3、H4 则获得稳健支持。

分析表明, 互联网渗透率和人均教育水平都未对政府应用社交媒体产生显著影响, 人均教育水平甚至与之负相关, 并在模型 3 中通过 0.10 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 公众需求与压力可能并非政府开通社交媒体的关键因素。因此, H5 和 H6 未获得支持。

政府规范方面, 政治民主、政府透明、媒体自由和政府审查都未对政府采用社交媒体产生显著影响。政府透明仅在模型 3 通过 0.10 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且其方向是负的。上述结果表明, 政府规范不是驱动政府应用社交媒体的关键因素, H7、H8、H9 和 H10 未获得支持。

最后, 反映国际竞争与学习的空间效应与全球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也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 其符号甚至是负的, 表明 H11 和 H12 未获支持。

6 讨论与结论

利用全球主要国家的截面数据, 本文对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在影响政府 2.0 的各类因素中, 政府资源与能力、公民压力、政府规范、府际竞争与学习效应的作用不尽相同。政府资源与能力是驱动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关键因素, 而公民需求与压力、政府规范以及府际竞争与学习效应则未显示显著作用。总而言之, 政府能力是驱动政府 2.0 的全球扩散的主要因素, 而政府动机(公民、政府自身和其他政府的影响)的作用没有获得证据支持。

本研究发现同其他研究结果略有差异。Lee 等的研究显示, 虽然电子政务受到国际竞争影响, 但电子民主则主要受国内因素的影响^[39]。社交媒体主要属于电子民主范畴, 而本研究发现同其结果相呼应, 即国际因素的影响不是最关键的, 相对来说国

内因素更为重要。但是, 本研究显示国内因素中的政治规范和公众需求并不重要, 至关重要的是政府能力。Ma 对中国政务微博采用的分析显示, 影响最大的变量是政府能力与府际竞争效应, 而公众压力和府际学习的影响不大^[20]。本研究同样发现政府能力对政府 2.0 扩散的重要作用, 但国际学习效应的假设未获支持。Katz 等的研究显示, 多数对全球电子政务发展产生影响的变量并没有对社交媒体和电子参与产生足够的解释力, 而公民需求的影响没有获得一致结果^[18]。本研究同样表明, 政府 2.0 的扩散显示有别于电子政务的一些特点, 而实证研究需要针对性地予以考察。

本研究发现, 政府资源与能力是影响政府 2.0 在全球扩散的关键因素, 而来自公民、政府自身和政府外部的各种驱动因素则没有显示显著作用。这些研究结果为进一步认识政府 2.0 的采用和扩散规律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推广举措提供了经验启示。本文揭示了政府 2.0 的全球扩散态势, 并识别了影响其扩散的关键驱动因素。作为较早对该现象展开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新兴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应用及其驱动因素。

本研究显示, 政府 2.0 的发展主要受到政府规模、财富状况、电子服务和电子民主等在内的政府资源与能力因素的影响, 而公众的需求与压力、政府自身的规范、国际竞争与学习效应等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可以对上述影响因素进行评估, 并利用可以控制和改变的因素加快社交媒体在政府部门的应用和推广。例如, 社交媒体的应用依赖于较强的电子服务与电子民主发展水平,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可以为相应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赞助, 以推动这些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应用和普及。各国政府也可以加强政府部门信息技术能力建设, 为社交媒体的使用和政府 2.0 时代的来临做好准备。

本研究结果提示如下未来研究方向。首先, 截面数据无法对政府 2.0 扩散的动态过程及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未来研究可以收集纵贯数据予以考察。其次, 最近研究显示, 政府创新的动机和能力存在交互关系, 二者往往缺一不可。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影响政府 2.0 扩散的关键因素的交互效应。再次, 未来研究可以考察政府部门对不同类型社交媒体技术的应用情况, 以研究政府采用与实施之间的差距^[18]。最后, 政府 2.0 的扩散过程是一个复杂链条, 许多因素都会在其中某个或某些环节发挥

作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社交媒体扩散的中介环节和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 [1] MCAFEE A. Enterprise 2.0: New Collaborative Tools for Your Organization's Toughest Challenges [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9.
- [2] THE NIELSEN COMPANY. State of the Media: The Social Media Report 2012 [R]. New York: The Nielsen Company, 2012.
- [3] EGGERS W D. Government 2.0: Using Technology to Improve Education, Cut Red Tape, Reduce Gridlock, and Enhance Democracy [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7.
- [4] MERGEL I. Social Media in the Public Sector: A Guide to Participation, Collaboration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Networked World [M].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2012.
- [5] ZAVATTARO S M. Social Media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s Future: A Response to Farazmand [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13, 45(2): 242-255.
- [6] UN. United Nations E-Government Survey 2012: E-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2.
- [7] SNEAD J T. Social Media Use in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3, 30 (1): 56-63.
- [8] BERMONT A. Senior Leaders' Use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in the Ontario Public Service [D]. Toronto: Ryerson University, 2011.
- [9] BONSON E, TORRES L, ROYO S, et al. Local E-Government 2.0: Social Media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 in Municipalities [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2, 29 (2): 123-132.
- [10] CHO S, PARK H.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novative Use of the Internet: The Case of the Twitter Activity of South Korea's Ministry for Food,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J]. Scientometrics, 2012, 90(1): 9-23.
- [11] GRANT W J, MOON B, GRANT J B. Digital Dialogue? Australian Politicians' Use of the Social Network Tool Twitter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0, 45 (4): 579-604.
- [12] KUZMA J. Asian Government Usage of Web 2.0 Social Media [J]. European Journal of E-Practice, 2010(9): 69-81.
- [13] MCDUGALL M. The Chinese Social Media Universe [M]. McDougall: Mathew, 2011.
- [14] CHIU C, LIN D, SILVERMAN A. China's Social-Media Boom [R]. Shanghai: McKinsey & Company, 2012.
- [15] 宋刚, 孟庆国. 政府 2.0: 创新 2.0 视野下的政府创新 [J]. 电子政务, 2012(Z1): 53-61.
- [16] 马亮. 公安微博的扩散研究: 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2(6): 4-14.
- [17] 马亮. 政务微博的扩散: 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J].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 2013, 10(1): 1-21.
- [18] KATZ J, HALPERN D. Political and Developmental Correlates of Social Media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A Global Survey of National Leadership Websit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3, 36(1): 1-15.
- [19] MA L. The Diffusion of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 Police Bureaus [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3, 15 (2): 288-309.
- [20] MA L. Diffusion and Assimilation of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3, doi: 10.1080/147190372012725763.
- [21] DIXON B E. Towards E-Government 2.0: An Assessment of Where E-Government 2.0 Is and Where It Is Headed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2010, 15 (2): 418-454.
- [22] ANDERSON P. Web 2.0 and Beyond: Principles and Technologies [M].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2012.
- [23] BERTOT J C, Jaeger P T, Grimes J M. Using ICTs to Create a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E-Government and Social Media as Openness and Anti-corruption Tools for Societies [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0, 27(3): 264-271.
- [24] CHANG A M, KANNAN P K. Leveraging Web 2.0 in Government [R]. Washington, DC: IBM Center for The Business of Government, 2008.
- [25] WALKER J L.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 [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9, 63(3): 880-899.
- [26] ROGERS E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M].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 [27] MOHR L B.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9, 63(1): 111-126.
- [28] DAMANPOUR 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 Meta-Analysis of Effects of Determinants and Moderator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1, 34(3): 555-590.
- [29] JEYARAJ A, ROTTMAN J W, LACITY M C. A Review of the Predictors, Linkages, and Biases in IT Innovation Adoption Research [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6, 21 (1): 1-23.
- [30] WALKER R M. Innovation Type and Diffus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Local Government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6, 84(2): 311-335.
- [31] BERRY F S, BERRY W D.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Models in Policy Research [M]//SABATIER P A.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7: 223-260.
- [32] 马亮. 政府创新扩散视角下的电子政务发展——基于中国省级政府的实证研究 [J]. 图书情报工作, 2012, 56(7): 117-124.

- [33] 马亮. 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因素: 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J]. 电子政务, 2013(9): 50-63.
- [34] CHRISTENSEN C M, ANTHONY S D, ROTY E A. Seeing What's Next: Using the Theories of Innovation to Predict Industry Change [M]. Cambridge,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4.
- [35] MOON M J, NORRIS D F. Does Managerial Orientation Matter? The Adoption of Reinventing Government and E-Government at the Municipal Level [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05, 15(1): 43-60.
- [36]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 2012 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3.
- [37] JUN K N, WEARE C. Institutional Motivations in the Adoption of Innovations: The Case of E-Government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1, 21(3): 495-519.
- [38] TOLBERT C J, MOSSBERGER K, MCNEAL R. Institutions, Policy Innovation, and E-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States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8, 68(3): 549-563.
- [39] LEE C P, CHANG K, BERRY F S. Tes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of E-Government and E-Democracy: A Global Perspective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1, 71(3): 444-454.
- [40] DOBBIN F, SIMMONS B, GARRETT G.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Public Policies: Social Construction, Coercion, Competition, or Learning?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7, 33(1): 449-472.
- [41] STRANG D, MEYER J W.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for Diffusion [J]. Theory and Society, 1993, 22(4): 487-511.
- [42] DAMANPOUR F. Organizational Size and Innovation [J]. Organization Studies, 1992, 13(3): 375-402.
- [43] LEE G, XIA W. Organizational Size and IT Innovation Adoption: A Meta-Analysis [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06, 43(8): 975-985.
- [44] NOHRIA N, GULATI R. Is Slack Good or Bad for Innov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5): 1245-1264.
- [45] MELITSKI J. Capacity and E-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 Analysis Based on Early Adopters of Internet Technologies in New Jersey [J].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6(4): 376-390.
- [46] MCNEAL R S, TOLBERT C J, MOSSBERGER K, et al. Innovating in Digital 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States [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3, 84(1): 52-70.
- [47] AZAD B, FARAJ S, GOH J M, et al. What Shapes Global Diffusion of E-Government: Comparing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Glob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0, 18(2): 85-104.
- [48] ROSE R. A Global Diffusion Model of E-Governance [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2005, 25(1): 5-27.
- [49] BUSSELL J. Explaining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Government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1, 55(1): 267-280.
- [50] KING G, PAN J, ROBERTS M E.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107(2): 326-343.
- [51] MOONEY C Z. Modeling Regional Effects on State Policy Diffusion [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1, 54(1): 103-124.
- [52] BERRY W D, FORDING R C, HANSON R L. Reassessing the "Race to the Bottom" in State Welfare Policy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03, 65(2): 327-349.
- [53] BENNETT C J. Understanding Ripple Effects: The Cross-national Adopt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for Bureaucratic Accountability [J]. Governance -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997, 10(3): 213-233.
- [54] STONE D. Learning Lessons and Transferring Policy across Time, Space and Disciplines [J]. Politics, 1999, 19(1): 51-59.
- [55] DREHER A, GASTON N, MARTENS P. Measuring Globalisation: Gauging its Consequences [M]. New York: Springer, 2008.
- [56] BOEHMKE F J, SKINNER P. State Policy Innovativeness Revisited [J]. State Politics & Policy Quarterly, 2012, 12(3): 303-329.
- [57] KEKIC L.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s Index of Democracy [J]. The Economist, 2007(21): 1-11.
- [58] TANZI V. Corruption Around the World: Causes, Consequences, Scope, and Cures [J]. Staff Papers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8, 45(4): 559-594.
- [59]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1 [R]. Washington, D.C.: Freedom House, 2011.
- [60] STINNETT D M, TIR J, DIEHL P F, et al. The Correlates of War (Cow) Project Direct Contiguity Data, Version 3.0 [J].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002, 19(2): 59-67.
- [61] BERRY F S, BERRY W D. State Lottery Adoptions as Policy Innovations: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0, 84(2): 395-415.

and theorists. This paper aims to evalua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ice performance since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reform has been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service science, solving this problem requires the methods that are appropriate for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In this paper, a network field experience approach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of 19 city governments of province and deputy province level. The research logic is based on the stratified sample principle. It is well known that in China, the governments of province and deputy province levels always have uniqu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of these governments could reflect the reality of the whole China. The 3-year tentative study shows that judging by an absolute consideration the 19 governments all do much worse in the process of serve the citizens. Relatively speaking, Xiamen, Ningbo, and Shanghai belong to the first group who serve the people bett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Shenyang, Dalian, Chongqing, Hangzhou, and Shenzhen rank behind the former three ones; while Chengdu, Tsingtao, and Wuhan achieve the least, and these governments can be titled "non-service governments". As a tentative service evaluating study, the paper has the limitations of all the service assessing researches. The first limitation lies in that different researchers have varied service experiences, and this may cause different assessing results. What's more, every government has far more than 5 divisions, and 5 service divisions may not represent the whole government they belong to. This forms the second limitation. The third limitation is that because the evaluating objects have far mor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than other local governments, they may mislead to a conclusion that can not reflect the overall service performance actualities in China. In the future study, these limitations should be overcome by some proper methodologi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offering the society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and giving some measures for the governments to improve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in the future. The value of the paper is that it offers a new service evaluating method of "net-field-experience" which is more suitable than the present popular ways such as questionnaire, experiment, Delphi method, and so on.

Article Type: Research Paper

Key Words: Government Service, Effect Evaluation, Network Field Experience, City Governments

(12) The Diffusion of Government 2.0 and Its Antecedents: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

Ma Liang • 127 •

(Nanyang Centr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639798)

Abstract ID: 1672-6162(2014)01-0127-EA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identify the key antecedents driving the diffusion of social media applications or Web 2.0 technologies among governments. The data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E-Government Survey Report concerning the adoption of social media applications in government web portals and other secondary country-level data are used, and Logit model is employed in this study. Four batteries of hypotheses, including government resources and capacity, public demand and pressures, government norm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learning effects, are proposed in line with the policy and innovation diffusion literatur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government resources and capacity including government size, wealth, e-government and e-democracy are the key drivers of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Government 2.0, whereas public demand and pressures, government norm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learning effects are insignificant. The key limitation of the study is that it focuses solely on the use of Facebook and Twitter by central governments of Unit-

ed Nation's member countrie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generalize the results to other levels of governments. Another difficulty arises from the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design employed in the study, which impedes causal inference. The findings reported in the paper generat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to understand the diffusion of Government 2.0. The results are also useful for governments to advance and better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applications. Expanding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policy and innovation diffusion, this study draws on the cross-country approach to posit and test a series of hypotheses that link the adoption of social media applications to various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s one of the first empirical studies investigating the diffusion of social media applications among governments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Article Type: Research Paper

Key Words: Government 2.0, Social Media, Innovation Diffusion, E-government, Cross-country Study

《公共管理学报》征稿启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重大部署, 全会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 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 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 内在地要求“科学的宏观调控, 有效的政府治理。”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什么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 它与中国发展的现阶段有什么样的关系? 如何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的建立? 诸多问题都需要中国公共管理学界通过理论的阐述、并结合实践进行深入和全面的解读。

以此为契机, 《公共管理学报》设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热点专题, 并期待收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相关研究成果; 尤其欢迎以事实为基础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证研究; 来稿以 10000 字左右为宜; 学界同仁来稿请注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热点专题。

投稿邮箱: GGGLXB@hit.edu.cn ; GGGLXB@126.com 。